



环境政治学译丛

Translation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地球政治学： 环境话语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澳] 约翰·德赖泽克 著
 蔺雪春 郭晨星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 环境政治学译丛 ·

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澳]约翰·德赖泽克 著
蔺雪春 郭晨星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澳)德赖泽克著;蔺雪春,郭晨星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3

书名原文: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ISBN 978-7-5607-3485-9

I. 地...

II. ①德...②蔺...③郭...

III. 生态环境-政治学-文集

IV. D0-05 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55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32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约翰·德赖泽克(John S. Dryzek),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理论教授,西方生态政治理论领域中的最权威性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生态政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相关著作包括《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审议民主及其超越》和《绿色国家与社会运动:美国、英国、德国和挪威的环境主义》等。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主导环境政治事务讨论的四种主要理论方法或环境话语，即生存主义、环境难题解决、可持续性和绿色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经过修订的 2005 年新版本是对现行生态政治理论或地球政治学的系统而清晰的评述，因而特别适合环境政治与政策专业的学生和对环境议题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总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



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诸多形成中的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



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基础性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在该译丛第一辑顺利出版的基础上,笔者在本辑中选择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著)、《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著)、《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著)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著)。这些著



作之所以被选，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著作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集中展现了“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环境政治学译丛”在第一辑出版仅仅两年多后得以继续，首先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05～2008）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它们为这一辑的译丛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助。其次，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和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等提供的各方面热情帮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做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最后，我的同事张淑兰博士、李宏博士和博士研究生蔺雪春与郭晨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承担了本辑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巨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07年8月于山东大学



译者说明

环境政治表达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政治关注,并切实关涉到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进而人与人关系的认知和安排。由于其认知对象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两个系统,而每一个系统本身又都极其复杂,因此对环境问题的这种政治关注便具有双重的复杂性。

这一点已在约翰·德赖泽克教授的著作中被明显反映出来。因此,对译者来说,有关该著作的翻译进程就不再那么简单。为了使国内读者能够尽量清晰地认知环境政治问题,理解约翰·德赖泽克教授对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话语分析,译者试图在直译的基础上,尽量关照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争取做到既尊重作者的原意,又能让中文读者通顺地阅读;最终或许能够使其产生更大的影响。

本书的翻译分工情况如下:郭晨星负责翻译了第1~6章,蔺雪春负责翻译了序言以及第7~11章。

但由于译者水平所限,或给读者造成诸多不便,种种责任自由译者承担。

蔺雪春 郭晨星

2007年6月于山东大学



中译版前言

《地球政治学》所分析的环境话语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重要的,因而我希望它们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就全球环境事务来说,中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发展道路可以采取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并对中国本身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状况产生不同的后果。尤其如此的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鉴于其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中国很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而及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十分重要的。

自本书第二版于2005年出版以来,环境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这种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对气候变化现实的更加清醒的认识。对这种变化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的因素包括: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以及他的电影《不愿面对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以及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2006年为英国政府撰写的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重要评论和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的持续努力。正如笔者在第2章结束时指出的,气候变化议题具有重新激活极限与生存话语的潜能,尽管这并不是其他环境话语对这一议题可以作出的唯一一种阐释。普罗米修斯主义——现在得到了石油公司巨头的资助,仍然在试图淡化这一议题。但是,目前已很少有政治家能够简单否认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连美国总统小乔治·布什也不



例外。

从地方层面上说，环境议题正在引导着公众政策的审议性公民参与，尤其是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政策方面。笔者希望，本书的最后一章已经清楚阐明，为什么在中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审议与参与机制特别适合于这类议题。

鉴于中国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极端重要性，我很高兴看到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出版。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所做的努力，使这一翻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约翰·德赖泽克

阿兰达，澳大利亚首都区

2007年6月





作者志谢

近四十年来,环境事务中发生了许多事情。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全球短缺与生态崩溃的可怕警告,环境危机出现了。自那时起,地球人口增加了50%多。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世人瞩目的核电站事故,在印度的博帕尔和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海峡还有引人注目的非核事故。绿党成为一股重要的选举力量,并在几个国家中加入了执政联盟。主流环境团体发展了大批的成员。反环境主义的民粹主义抵抗已经爆发。有关气候变化和臭氧层衰竭的全球环境议题也已走到了前台。我们已拥有了世界峰会、地球日、环境总统、生态捣乱、公民不服从、大量的立法与管制,以及追求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深生态学、反全球化和“明智使用”的运动,等等。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所有这些进展的含义,而笔者是通过运用环境话语的概念来做到这一点的。话语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共有方式。某种话语的支持者在讨论一个事件时将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从而使他们的讨论基于某些共同的定义、判断、假设和论点。比如,在一种相信不加控制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没有问题的话语和一种谋求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重新实现和谐的激进绿色话语之间,所呈现出的共同点相当少。环境事务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所考察的话语的历史,它们的兴起与衰落,以及它



们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结果是，所有这些话语依旧与我们同在，无一半途而废（这本身就表明了环境事务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我将阐述它们的历史，评估它们作为环境事务应对方法的影响、优势和缺陷。

我尽力从一种批判性的超然立场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我的确有许多强烈的个人观点。我把对这些个人观点的表述放在了“生态民主”标题下的结论部分，尽管它们偶尔也会较早地呈现出来。

本书发轫于1994年9月9日中午12点45分，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蒂姆·巴顿(Tim Barton)建议我写这本书。2004年9月9日，也就是说在十年之后，我完成了本书的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露丝·安德森(Ruth Anderson)对本书第二版的出版提供了帮助。在第二版里，我考虑并想尽力弄清环境政治及其著述又一个八年的意蕴，以及读者对本书第一版的反应。本书在概念化方面有许多变化，比如第9章和第10章在讨论绿色激进主义时，重点放在了绿色意识和绿色政治上，淡化了第一版中尝试的但并不怎么成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连续统一体。

本书更深层的生命力来自数年来与同学们、学者们和活动家们的讨论。在美国俄勒冈的八年时间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约瑟夫·伯兰德(Joseph Boland)、戴维·卡鲁瑟斯(David Carruthers)、伊里尼·戴蒙德(Irene Diamond)、丹·古里奇(Dan Goldrich)、杰夫·兰德(Jeff Land)、杰瑞·迈基(Gerry Mackie)、迈克尔·麦克吉尼斯(Michael McGinnis)、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Mitchell)、阿兰·莫尔(Alan Moore)、戴维·施劳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斯图亚特·舒尔曼(Stuart Shulman)、保罗·西厄斯(Paul Thiers)、米切尔·韦尔什(Michael Welsh)。在澳大利亚，我的生态政治对话者包括：马克·卡登(Mark Carden)、彼得·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ff)、史蒂夫·达沃斯(Steve Dovers)、戴维·唐恩(David Downes)、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西蒙·格兰特



(Simon Grant)、卡洛琳·亨德里克斯(Carolyn Hendriks)、尼古拉斯·罗夫(Nicholas Low)、弗雷亚·马休斯(Freya Mathews)、西蒙·尼米耶(Simon Niemeyer)、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阿德里亚纳·西蒙斯(Adrianna Semmens)、卡桑德拉·斯达(Cassandra Star)、理查德·西尔凡(Richard Sylvan)、耶纳·汤普逊(Janna Thompson)、肯·沃尔克(Ken Walker)、戴维·耶肯(David Yencken)。在其他地方,我的通信者和交谈者包括:特伦斯·保尔(Trencè Ball)、布伦丹·巴瑞特(Brendan Barrett)、约翰·巴里(John Barry)、罗伯特·巴特雷特(Robert Bartlett)、加瑞·布莱纳(Gary Bryner)、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蒂姆·克拉克(Tim Clark)、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弗兰克·菲舍尔(Frank Fischer)、乔治·冈萨莱兹(George González)、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阿道夫·甘德森(Adolf Gundersen)、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布朗温·海沃德(Bronwyn Hayward)、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汉斯-克里斯蒂安·赫尼斯(Hans-Kristian Hernes)、克里斯蒂安·胡诺德(Christian Hunold)、苏珊·亨特(Susan Hunter)、迈克尔·雅克伯斯(Michael Jacobs)、威廉·拉佛蒂(William Lafferty)、奥鲁夫·朗赫勒(Oluf Langhelle)、李尚勋(Sang-Hun Lee)、詹姆斯·莱斯特(James Lester)、斯蒂格·托夫特·麦德森(Stig Toft Madsen)、詹姆斯·米都克罗夫特(James Meadowcroft)、约翰·迈耶(John Meyer)、文素宏(Soon-Hong Moon)、阿恩·纳什(Arne Naess)、理查德·诺加德(Richard Norgaard)、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罗伯特·皮尔克(Robert Paehlke)、托马斯·普林森(Thomas Princen)、加莱格·雷摩曼(Craig Rimmerman)、保罗·瓦普纳(Paul Wapner)、阿尔伯特·韦勒(Albert Weale)、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爱德华·伍德豪斯(Edward Woodhouse)、伊瑞斯·扬(Iris Young)、奥兰·扬(Oran Young)。此书所采取的



构架主要采纳了道格拉斯·陶格逊(Douglas Torgerson)和马腾·哈杰尔(Maarten Hajer)的建议(马腾强调每一本书都应该以民主获得拯救的一章来结尾)。我一直和戴维·施劳斯伯格忙于共同编著此书的姊妹篇：《辩论地球》，而且从他的灼见和建议中受益良多。感谢所有他们这些人，环境领域现在还活跃着、成长着，而且是社会科学、哲学、公共政策中某些最令人感兴趣的对象，这使得本书的写作容易了许多。

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经典著作《风险社会》的序言中说，他写大部分内容时俯瞰着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而且读者应该想象得出作为其背景的一个湖。我撰写本书第一版的大部分内容时则俯瞰着一个垃圾场，而现在那里是一个公园。这第二版完成于一个令人愉快的旱地硬叶森林环境中，读者应能想象得出其背后有着高大的桉树和鸚鵡的鸣叫声(但要当心灌木着火)。

约翰·德赖泽克
阿兰达，澳大利亚首都区
2004年9月



目 录

| | |
|----------------------|------|
| 总序 | (1) |
| 译者说明 | (1) |
| 中译版前言 | (1) |
| 作者志谢 | (1) |
| 第一部分 导 言 | (1) |
| 第一章 什么是地球政治学——一种话语方法 | (3) |
| 1. 变化着的环境政治术语 | (3) |
| 2. 一种话语方法 | (8) |
| 3. 主要环境话语的分类 | (13) |
| 4. 关于话语的一些问题 | (17) |
| 5. 话语造成的不同 | (20) |
| 6. 话语分析的使用 | (22) |
| 第二部分 地球极限及其否认 | (25) |
| 第二章 隐现的悲剧:生存主义 | (27) |
| 1. 生存主义的起源 | (27) |
| 2. 极限及其超越 | (30) |
| 3. 生存主义的政治哲学 | (36) |
| 4. 生存主义的话语分析 | (38) |